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sup>\*</sup>

张中元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为实现人类美好未来提出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作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会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利于中国实现新时代外交工作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在总体上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或升级伙伴关系,在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美国遏制以及其他前期类似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提高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似度,进而提高了彼此国家利益的重合度。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尽管中国向世界真实、全面地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存在一些困难,甚至面临一些国家的恶意曲解,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带来了挑战,但总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中国双边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指南,而中国外交也将有力推动这一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访问; 伙伴外交; 外交政策相似度; 排序 logit 模型

**【作者简介】** 张中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邮编 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1)12-0024-30

<sup>\*</sup>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为实现人类美好未来提出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构建平等、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助于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外交访问(包括出访来访)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抓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实现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目标,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伙伴外交关系建立和伙伴关系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是否对双边外交政策相似度起到了提升作用?本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对建立、升级伙伴关系以及国家间的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一 文献综述

要成为一个在外交上有吸引力的国家,一国必须有自己的外交理念,能够在经济层面以及更深层面上提出吸引他国的愿景。<sup>①</sup>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中国话语表达了中国的情感、理念、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对中国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及其影响下的行为方式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sup>②</sup>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性原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模式和努力方向,对中国外交发挥着引领作用。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引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在于理解“命运共同体”中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及其理性基础,<sup>③</sup>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是一种思想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其最大的特色是在宽广的领域汇聚人类共同价值追求,<sup>④</sup>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同国际社会一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变成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

① Martha Finnemore, "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2009, pp.58-85.

② 李慧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4页。

③ 郭树勇、于阳《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与“新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第5页。

④ 徐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17页。

交、“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亚洲安全观等一系列外交新理念陆续提出,这些理念伴随着中国外交实践而不断丰富,日益被世界和国际社会所理解、接受和认同,并逐渐由中国话语转变为世界话语,<sup>①</sup>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原则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当前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出发,对当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提出了明确主张,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从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人类整体的高度看待国际关系,主张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并由此形成一套基于命运共同体规则的新型国际规范,推动建设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时代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实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元包容特征突破和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政治,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民主分配,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构建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sup>②</sup>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系统价值导向与政策主张,强调政治上平等相待、经济上互利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共建共享、生态上尊崇自然,为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近年来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外交访问活动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双边外交以及经济发展合作关系,既促进了国际伙伴网络中的行为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发掘中国与外国潜在的共同利益,又能保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弥合与他国的利益分歧。中国是伙伴外交的主要提倡者和实施者,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起,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合作的重点任务。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100多对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外交同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相契合,是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交工具。

<sup>①</sup>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38页。

<sup>②</sup> 仇华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新时代外交实践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4页。

最大限度地运用好外交手段广结伙伴、为国家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职责和内容。伙伴关系有利于国际互动,双方都相信伙伴关系可以通过反复交流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和加深国家间信任,从而促进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被视为参与方愿意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同时化解更多冲突问题。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可能难以达成一致,但在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范围上取得了重要进展。<sup>①</sup> 建立伙伴关系表明中国有意与伙伴国合作,以便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共同提高改革和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改革。<sup>②</sup>

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持续提升推动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更加良性的政治经济互动。中国伙伴外交的高度灵活性根植于中国与伙伴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出于加强经济交往、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等战略考虑,中国已经在很多国家形成政治影响力,表现为这些国家在某些国际政治议题上同中国保持一致立场,<sup>③</sup>这意味着中国与伙伴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持有相同的观点或采取相似的行动。外交政策相似度也被称为外交政策的趋同(convergence),可以用来衡量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重合度。有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国投资额的增长能够显著提升与该国的外交政策相似度,有助于中国与该国建立更和谐的政治关系。<sup>④</sup>

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的趋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一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越相似,也意味着双边政治关系更加和谐。但政治关系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会因为政府更迭、权力转移、领土争端、极端事件而发生变化。<sup>⑤</sup> 因此在不同的领域,由于各国的关注点不同,各国外交政策中会存在一定差异性。他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突然调整不仅会导致中国与该国双边关系的波动,也会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挑战。<sup>⑥</sup> 各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其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对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外交关系发挥显著的稳定作用。

① Richard Maher, "The Elusiv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4, 2016, pp.959-976.

② Ana Pante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udia Universitatis Babeş-Bolyai Sociologia*, Vol.62, No.3, 2017, pp.285-293.

③ 迟永《中国对外贸易提高了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133页。

④ 杨攻研、唐廷凤《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与外交相似度——基于联合国投票的量化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0页。

⑤ 戴利研、李震《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第94页。

⑥ 查雯、李响《领导集团更迭与外交政策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53页。

## 二 研究假设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了伙伴关系网络,但对象选择受对方战略合作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影响。因此,中国伙伴外交有着不同层次、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分,具体包括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进入成熟和完善阶段,如面对新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挑战,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由“互利”转变为强调“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周边稳定和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sup>①</sup> 在实践层面,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全球布局更加均衡化,伙伴关系的数量快速增加,形式和内涵也更加多样化。<sup>②</sup> 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伙伴关系的质量也进一步提升。<sup>③</sup>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更有助于中国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并促进双边伙伴关系的升级。

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其全面性与战略性不断深化。中国领导人通过首脑外交(本文归类为正式访问)等多种外交形式致力于传播促进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进多边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推动形成稳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伙伴外交关系,充分彰显了双方建立互信的诚意以及相对友好的政治关系。从具体伙伴关系建立或者升级的时间可以看出,首脑外交是伙伴关系网络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访问哪些国家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优先项,在伙伴关系中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不仅涉及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活动,还涉及大量的外交资源用于制定和承诺伙伴关系合作。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的首脑外交更加突出活跃,成为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双边外交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交流机会。高层领导外交接触越多,该国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sup>④</sup>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① 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12—13页。

② 如在2017年3月21日,中国与以色列确认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成为继瑞士之后第二个同中国发展以“创新”为标志的伙伴关系国家。

③ 如在2014年,阿根廷、澳大利亚、德国、蒙古国和委内瑞拉等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④ Samuel Brazys and Alexander Dukalskis,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China, the UNGA,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4, 2017, pp.742-764.

假设 2: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正式访问比一般访问更有助于中国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并促进双边伙伴关系的升级。

联合国大会为国际政治多方角力提供了平台,一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在不同国际问题上表达其立场的机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不同地区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存在差异。中国在外交政策中遵循道德价值观,倾向于以道德榜样影响他国,通过提供利益而不是使用胁迫来吸引支持者。<sup>①</sup>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

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制中与他国协调立场、促进双方各领域交流,有利于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通过互利合作消除伙伴国的不稳定因素。在“扩大朋友圈”理念指导下,中国遵循双方互利共赢的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为标准,强调集体安全和共同治理。中国倡导外交合作开放性,不排斥伙伴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及地区大国建立联盟关系,有助于地区国家缓解安全困境。中国外交主张“以发展促和平”,倡导经济和安全的二元融合,促进伙伴国的经济社会进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了中国不断增强的解决冲突意愿和逐步提升的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他国的军事外交政策相似度。

假设 4b: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他国的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

国家利益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能导致潜在冲突,<sup>②</sup>伙伴外交有助于通过国际外交努力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消除双方政治分歧。漆海霞通过对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如果一国与中国实现了伙伴关系的升级,该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与中国立场将会趋近。<sup>③</sup>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

<sup>①</sup> Deborah Welch Larson, "Can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Role of Moral Leadership,"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2, 2020, pp.163-186.

<sup>②</sup> Colleen Chidley,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lig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kon*, Vol.41, No.1, 2014, pp.141-157.

<sup>③</sup> 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页。

交互作用使得两国外交政策的协调和趋同更加有效,能够获得对方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所持决议立场的支持。首脑外交作为一种“威望外交”,对双边外交政策相似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影响。<sup>①</sup>此外,外交伙伴关系通过外交活动与各国进行多方面接触,以获得对方的规范性支持,<sup>②</sup>为双边经济和政治合作创造有利环境。因此,伙伴关系外交通过保持良好稳定的互动关系,培育友善的合作氛围,有助于实现合作共赢,弥合意识形态分歧,使伙伴能够追求各自利益和外交偏好。<sup>③</sup>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 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通过直接效应和以伙伴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或伙伴关系升级)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相似度的中介变量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对中国与他国的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三 实证分析框架

#### (一)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双边伙伴关系以及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t} + \alpha_2 Treat_{it} * post_t + Z\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1}$$

其中  $i$  表示中国外交出访国或对中国的来访国,  $t$  表示年份;  $y_{it}$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双边外交关系,主要用他国与中国所建立的层级伙伴关系( $partner_{it}$ )以及他国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趋同程度( $svote2ch_{it}$ )来测量。 $Treat_{it} \times post_t$  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当年安排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 $Treat_{it}$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前后( $post_t$ )”两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如果当年安排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虚拟变量  $Treat_{it}$  赋值为 1,否则为 0;虚拟变量  $post_t$  在 2013 年以后赋值为 1,其余为 0;交叉项估计系数  $\alpha_2$  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程度。 $Z$  表示中国外交出访国或对中国的来访国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双边贸易、军事关系以及各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治理水平等; $\mu_i$  和  $\lambda_t$  分别表示各

① Samuel Brazys and Alexander Dukalskis,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China, the UNGA,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pp.742-764.

② Stefan A. Schirm, “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2, 2010, pp.197-221.

③ Georg Stru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0, No.1, 2017, pp.31-65.

国的固定效应和年度时间固定效应项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还整理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对中国来访的频次 ( $dipview_{it}$ ) 以反映双边外交活动的强度。为了检验双边外交活动强度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设定如下模型:<sup>①</sup>

$$y_{it} = \alpha_0 + \alpha_1 dipview_{it} + \alpha_2 post_t * dipview_{it} + Z\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2}$$

被解释变量是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_{it}$  时,该变量是多值离散数据,本文在对伙伴关系层级赋值时进行了排序,因此  $partner_{it}$  是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本文对式 1 或式 2 采用排序 logit(ordered logit) 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并采用多项 logit(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对式 1 或式 2 进行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是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变量  $svote2ch_{jit}$  时,该变量是二值变量, $j$  表示联合国大会的某一项投票  $j$  和  $t$  与式 1 中相同。在理论上,中国与他国构建伙伴关系对外交政策互动和趋同(或趋异)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外交访问除了对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直接影响外,还有可能通过构建伙伴关系对外交政策互动产生间接影响,可在式 1 或式 2 中加入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_{it}$ :

$$svote2ch_{jit} = \gamma_0 + \gamma_1 dipview_{it} + \gamma_2 post_t * dipview_{it} + \gamma_3 partner_{it} + Z\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3}$$

从式 3 中可以看出,如果回归参数  $\gamma_2$  是显著的,则交互项  $post_t * dipview_{it}$  变量能对外交政策相似度变量  $svote2ch_{jit}$  产生直接影响;如果回归参数  $\gamma_3$  是显著的,同时式 2 中回归参数  $\alpha_2$  也是显著的,则交互项  $post_t * dipview_{it}$  变量能通过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_{it}$  对外交政策相似度变量  $svote2ch_{jit}$  产生间接影响。这实际上是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外交访问对外交政策相似度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即以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_{it}$  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相似度的中介变量并检验其中介效应。

还可以通过进一步作交叉项方式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外交访问通过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_{it}$  对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为此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svote2ch_{jit} = \varphi_0 + \varphi_1 dipview_{it} + \varphi_2 partner_{it} + \varphi_3 dipview_{it} * post_t + \varphi_4 partner_{it} * post_t + \varphi_5 dipview_{it} * partner_{it} + \varphi_6 dipview_{it} * partner_{it} * post_t + Z\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4}$$

<sup>①</sup> 实际上式 2 中的  $dipview_{it}$  项应为  $Treat_{it} * dipview_{it}$ , 但  $Treat_{it} * dipview_{it} = dipview_{it}$ , 因此该项可以简写,同理  $post_t * dipview_{it}$  项也是如此。



变量  $dipview_{it} * partner_{it} * post_{it}$  的系数  $\varphi_6$  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外交访问与建立伙伴关系对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趋同的影响。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1. 因变量: 双边外交关系

第一个变量是伙伴关系。在外交部网站列示的 196 个国家中,根据对双边关系的表述中是否带有“伙伴”这一关键词,本文整理出 84 个伙伴关系国家(截至 2021 年 3 月)。为了反映伙伴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合作范围,考察在伙伴关系的表述中所用的范围限制,如“全方位”“全面”都是修饰双方交流范围程度的用语,这些用语的不同反映了伙伴关系类型之间的差异。<sup>①</sup> 伙伴关系通常需要时间发展并经历不同阶段,如许多伙伴关系最初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后来逐渐演变为“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般而言,伙伴关系互动程度相对较低,建立该关系追求的并不是对伙伴国施加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努力,以确定未来合作是否可行。相比之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常与更广泛的议程和更正式的合作机制一起推进,要求双方的合作建立在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战略”一词意味着双方交流的档次和规格更高,在涉及整体或全局的核心利益上双方具有相似性,能够在政策上相互支持和配合,致力于消除冲突和分歧。其中,战略伙伴关系可能会局限于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可以在政治、经济、国际和地区事务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中国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非常谨慎,在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之前,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政治信任、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其他领域良好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常还包括详细的双边合作议程,并规定建立具体的沟通渠道,以促进国家领导人和不同政府部门的高级代表之间的定期交流。如果按合作领域的数量来计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在政治和军事合作领域。

一些研究将外交伙伴关系分为三类: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sup>②</sup> 结合前述讨论,本文将伙伴关系划分为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

<sup>①</sup> 例如,1996 年中国首次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 年,两国将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合作水平有所提高。印度和中国于 2004 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 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迈进,加入“紧密”一词表明双方都有意愿进一步改善关系。参见 Quan Li and Min Ye, “China’s Emerging Partnership Network: What, Who, Where, When and Why,”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Vol.3, No.2, 2019, pp.66-81.

<sup>②</sup> Georg Stru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p.31-65; Quan Li and Min Ye, “China’s Emerging Partnership Network: What, Who, Where, When and Why,” pp.66-81.

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四个层级。在这四个层级中,双边亲密程度和合作范围依次增强。<sup>①</sup>在本文整理的84个伙伴关系国家中,有1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18个国家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50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6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本文样本期间内(2002—2019年),中国与有些国家将伙伴关系进行了升级,<sup>②</sup>因此以上各类伙伴关系涉及的国家会有重叠。在实施与伙伴国的战略合作方面,中国既可以利用双边渠道,也可以利用多边平台与一些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建立各类伙伴关系。<sup>③</sup>例如2003年,中国与东盟10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等。因为本文重点考察双边伙伴关系,因此在整理伙伴关系时不包括中国与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所建立的伙伴关系。

根据以上分类,本文对四个层级伙伴关系进行了赋值:在伙伴关系变量中,没有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应该变量赋值为0;建立合作伙  
伴的国家,对应该变量赋值为1;建立全面合作伙  
伴的国家,对应该变量赋值为2;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的国家,对应该变量赋值为3;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的国家,对应该变量赋值为4。伙伴关系变量(*partner*)是一个排序变量,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2002—2019年。

第二个变量是外交政策相似度。测量国家间外交政策相似度的方法较多,如依据

① 外交部网站的相关表述比较多样,合作伙伴包括:友好伙伴如牙买加(2005年)、发展伙伴如印度(2014年)、合作伙伴如波兰(2004年)、互信伙伴如蒙古国(2003年)、睦邻伙伴如尼泊尔(1996年)等。全面合作伙伴包括:全面合作伙伴如韩国(2003年)、全面伙伴如以色列(2017年)、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如马尔代夫(2014年)等。战略(合作)伙伴包括:战略合作伙伴如斯里兰卡(2013年)和战略伙伴如智利(2012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如南非(2010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如缅甸(2011年)、全方位战略伙伴如德国(2014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如巴基斯坦(2015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如俄罗斯(2011年)等。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所有伙伴关系中唯一出现的一种关系,“全方位”与“全面”在外文中是同一个单词,但中国的理解有所不同,“全方位”伙伴关系指双方的合作将是多方位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是中国与俄罗斯一国建立的单独伙伴外交关系,协作是指双方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共同进退,能增加国家间的信任感;到2019年,中俄两国将这一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一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全天候”是指无论国际局势和双方国内局势如何变化,双方都能进行全时段、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从理论上讲,全方位战略伙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比其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层级要高,但由于涉及国家较少,因此依然将其归类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② 例如2009年中国与尼泊尔将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到2019年两国又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

③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China-Arab Stat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Myth or Realit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8, No.3, 2014, pp.70-101.

同盟责任考察外交政策相似度、相似度分值(similarity scores)以及根据联合国大会投票计算各国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的理想点(ideal point)等。<sup>①</sup>联合国大会是成员国利益协调和交换的主要场所,也是各国政策获得传播和认可的关键平台。与其他外交政策行为不同,联合国大会的许多议题并不直接涉及国内问题,大部分民众可能并不关心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特定主题。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虽然可能涉及与他国的协商,但并不能严格反映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其最终投票选择反映了各国政府的自主决定。联合国大会针对各项议题的投票行为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相关议题的政治偏好,投票选择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立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间关系状况。<sup>②</sup>因此,两国就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选择代表着该国与该国政治倾向的相似性,构成了利益相似性和外交政策相似度衡量标准的基础,可以作为一种反映意识形态和政策合法性的指标和信号,用来衡量一国与他国的国际政治倾向和政策倾向的趋同。<sup>③</sup>联合国大会投票具有成员资格广泛、缺乏国际法律约束以及投票一事一议等特征,使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记录各国外交政策立场和取向的潜在指标,<sup>④</sup>因此可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数据研究国际体系的极、对外援助实效以及联盟构建和冲突概率等。<sup>⑤</sup>

如果中国与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趋于相似,意味着中国与该国在对待某一国际事务的立场趋于相似,表明中国与该国在外交政策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本文直接利用2002—2019年1449项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其中中国参与投票1427项、缺席投票22项)测算中国与他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场的趋同。数据来自美国

① 刘倩《独奏抑或共鸣:全球议题合作中的金砖国家——以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为例》,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0页。

② 孙忆、孙宇辰《自由贸易协定能提升国家间亲密度吗?——基于中国周边FTA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139页。

③ Erik Gartzke,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 No.1, 1998, pp.1-27; Alberto Alesina and David Dollar,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5, No.1, 2000, pp.33-63.

④ Michaela Mattes, Ashley Leeds and Royce Carroll, "Leadership Turnover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Societal Interests,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Vot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9, No.2, 2015, pp.280-290.

⑤ Erik Voeten, "Resisting the Lonely Superpower: Response of States in the UN to US Dom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3, 2004, pp.729-754; Axel Dreher, Peter Nunnenkamp and Rainer Thiele, "Does US Aid Buy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s?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Public Choice*, Vol.136, No.1-2, 2008, pp.139-164; Erik Gartzke, "Preferenc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4, No.2, 2000, pp.191-212.

学者埃里克·沃顿(Erik Voeten)整理发布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sup>①</sup>针对一项投票,各国对投票立场的选择有赞成(yes)、弃权(abstain)、反对(no)和缺席(absent)四种。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投票趋同可直接按投票选择的比较来测量,如果两国均选择相同的投票方案(如同时选择同意、弃权或反对,但不包括缺席),则赋值外交政策相似度变量为1,其他情形为0。

对于每次投票,本文还计算投赞成票的比例(*yshare*),即投赞成票的票数占总投票数的比例。此外,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议题中包括了不同领域,各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投票倾向往往反映了国家间关系的现状及历史演变特点,也是影响国家间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本文还选取三个领域检验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投票趋同:一是与核武器和核材料有关的投票(*NU*);二是与军备控制和裁军有关的投票(*DI*);三是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投票(*EC*)。

## 2.核心解释变量:外交访问

每年出版的《中国外交》白皮书都在附录部分整理了该年度中国重要外交活动。其中外交访问活动既包括出访,也包括外宾来访。按照访问的性质,本文将外交访问活动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出席会议、会见和一般访问等形式,分别统计该年度中国在上述各分类内出访和接待来访的次数。将以上各种访问活动的次数按出访和来访分别加总后,记为 *dipviewo*、*dipviewi* 两个变量,两者加总得到总外交访问变量(*dipview*)。在出访和来访的分类活动中,国事访问是指国家元首应他国元首邀请进行的访问,接待规格非常正式,完全按外交礼仪安排;正式访问是指一国领导人应另一国领导人的正式邀请,对邀请国进行的访问。国事访问与正式访问的礼宾规格有差异,但活动安排基本相同,因此在统计时将其合并,记为 *offiv*;其余工作访问、出席会议、会见和一般访问等类型合并,记为 *genw*。对应总外交访问、出访外交访问、来访外交访问、正式访问、一般访问等频次变量分别构建总外交访问虚拟变量 *dvdummy*、出访外交访问虚拟变量 *dvodummy*、来访外交访问虚拟变量 *dvidummy*、正式访问虚拟变量 *offdummy*、一般访问虚拟变量 *gvdummy*。其中,如果各外交访问频次变量取值大于0,则其对应的外交访问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本文整理了2002—2019年《中国外交》白皮书中的外交活动。此外,针对外交活动中是否签发联合公报构建变量 *comique*,如果签发联合公报,变量 *comique* 赋值为1,否则变量 *comique* 赋值为0。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Voeten>, 访问时间:2021年2月17日。

### 3.其他控制变量

(1) 双边经贸联系变量。贸易和经济利益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经济和战略利益是外交伙伴关系的核心。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的增多,商业关系日益多样化和正规化,中国与外国经济利益的互补性越来越强,各国从经济和其他实际利益出发会支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sup>①</sup>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经贸联系并向中国出口商品。因此,中国是潜在商业伙伴的吸引力将对伙伴关系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利益是解释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sup>②</sup>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规模越大,该国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sup>③</sup>物质联系有助于政策趋同和加强观念共识,尽管这些共识的范围和程度仍受一些战略和政策分歧的限制。因此,本文纳入双边经贸联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该变量以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强度变量 *ex2gdp* 来测量,是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对该国的进口强度变量 *im2gdp* 是中国从该国的进口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双边贸易数据和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sup>④</sup>

(2) 双边军事联系变量。武器生产国可能将武器交付作为影响其外部安全的手段,出口武器不仅带来收入收益,还会影响出口国的安全,因为接受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会产生安全外部性。一项关于武器出口贸易与国内国防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武器出口产生的正安全外部性会削减军费开支,从而在国内国防开支和武器出口之间产生了替代效应。如果以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作为确定“结盟”(创造正外部性)和“不结盟”(创造负外部性)国家的标准,则发现向结盟国家出口武器减少了国内军事开支。<sup>⑤</sup>本文构建中国武器出口强度变量 *tivc2gdp*,该变量是中国对该国的武器出口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对该国的武器出口数据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SIPRI武器转让

<sup>①</sup> Hoang Thi Ha, "Understanding China's Proposal for an ASEAN-Chin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ASEAN's Ambivalent Respons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41, No.2, 2019, pp.223-254.

<sup>②</sup> Georg Stru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pp.31-65.

<sup>③</sup> Samuel Brazys and Alexander Dukalskis,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China, the UNGA,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pp.742-764.

<sup>④</sup>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STAT,"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0日。

<sup>⑤</sup> Oliver Pamp, Florian Dendorfer and Paul W. Thurner, "Army Our Friends and Save on Defense? The Impact of Arms Exports on Military Expenditures," *Public Choice*, Vol.177, No.1-2, 2018, pp.165-187.

数据库(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中的进出口趋势指标值表(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该数据库提供了一国武器进口或出口的总趋势指标值。<sup>①</sup>

(3) 国家其他特征变量。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政权类型以及来自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压力是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偏好变化的最常见原因。一国的投票可能受到其战略动机、区域/全球影响力和物质激励的影响,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可能改变投票偏好。一个国家的能力水平越高,改变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小。规模更大、经济更富裕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可以用来使自己免受他国的外交或经济压力。有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和较为富裕的国家不会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轻易改变立场。<sup>②</sup>因此,本文纳入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来控制国家的规模和收入水平。经济规模 *size* 是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价格计算)取自然对数计算,发展水平 *develp* 是对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价格计算)取自然对数计算。<sup>③</sup>

此外,还包括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 *egroth* 按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计算,该数据来自 UNCTAD 数据库。国家治理质量 *wgi* 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将司法有效性(rule of law)、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贪腐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政治稳定程度(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发言权和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六项治理质量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国治理质量变量。<sup>④</sup>

##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1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伙伴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伙伴关系变量。该变量是一排序变量,因此采用排序 logit 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回归的准  $R^2$  在 0.57 左右,拟合程度较好。在模型1中,外交访问虚拟

<sup>①</sup>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 <https://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0日。

<sup>②</sup> Samuel Brazys and Diana Panke, "Why Do States Change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8, No.1, 2017, pp.70-84.

<sup>③</sup> 该数据来自 UNCTAD 数据库。参见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STAT,"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0日。

<sup>④</sup> The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访问时间:2021年6月10日。

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vdummy* po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处理组(当年安排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与对照组(当年没有安排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的结果变量(双边伙伴关系)在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台前是否具有共同的时间趋势,这是本文计量模型识别策略的关键假设。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式 1 扩展为如下形式进一步检验: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t} + \sum_{t=2006}^{2019} \delta_t Treat_{it} * ydummy_t + Z\bet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5}$$

其中  $ydummy_t$  是年份虚拟变量,2013 年为基准年份,系数  $\delta_t$  反映了第  $t$  年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伙伴关系评级得分差异相对于 2013 年差异的大小。如果共同趋势假设成立,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前年份(2013 年以前)的估计系数  $\delta_t$  ( $\delta_{2006}, \delta_{2007}, \dots, \delta_{2012}$ ) 均不显著。估计系数  $\delta_t$  的大小及其 95% 置信区间如图 1 所示。其中,图 1 的竖线表示 95% 置信区间,在 2013 年前,年度估计系数 95% 置信区间均包括 0。这说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前,当年安排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与当年没有安排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评级得分不存在显著的事前趋势差异,具有共同变化趋势。而在 2013 年后,年度估计系数  $\delta_{2014}, \delta_{2015}, \dots, \delta_{2019}$  均显著为正,说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该理念对当年安排了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与当年没有安排中国外交出访或外国来访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评级得分开始具有显著影响,这符合本文分析的影响路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

表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虚拟变量 $dvdummy$	-0.1644 (-0.940)	-0.098 (-0.553)	-0.137 (-0.780)	0.192 (0.663)
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vdummy* post$	1.817*** (9.319)	1.655*** (8.210)	1.718*** (8.253)	
安慰剂检验交叉项 $dipview* y2008$				0.414 (1.378)
“一带一路” $BRI* y2015$		0.759*** (2.812)		
美国遏制 $USAall* y2012$			0.350 (1.344)	

续表 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签发联合公报 <i>comique</i>	-0.913 (-1.003)	-0.872 (-0.965)	-0.934 (-1.027)	-0.826 (-0.687)
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强度变量 <i>ex2gdp</i>	0.121 (0.689)	0.149 (0.860)	0.110 (0.627)	1.215 <sup>†</sup> (1.625)
中国对该国的进口强度变量 <i>im2gdp</i>	0.966 <sup>***</sup> (2.651)	1.035 <sup>***</sup> (2.836)	0.951 <sup>***</sup> (2.632)	-1.075 (-1.364)
中国武器出口强度变量 <i>tivc2gdp</i>	-27.451 (-0.185)	-36.551 (-0.247)	-23.371 (-0.158)	121.823 (0.526)
经济规模 <i>size</i>	21.354 <sup>***</sup> (12.031)	21.354 <sup>***</sup> (11.893)	21.275 <sup>***</sup> (12.033)	13.534 <sup>***</sup> (3.412)
发展水平 <i>develp</i>	-17.483 <sup>***</sup> (-8.921)	-17.934 <sup>***</sup> (-8.981)	-17.449 <sup>***</sup> (-8.935)	-5.075 (-1.103)
经济增长率 <i>egroth</i>	-0.053 <sup>***</sup> (-2.824)	-0.052 <sup>***</sup> (-2.788)	-0.052 <sup>***</sup> (-2.759)	-0.006 (-0.199)
国家治理质量 <i>wgi</i>	0.322 (0.526)	0.409 (0.664)	0.432 (0.698)	-1.302 (-0.961)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样本数	3202	3202	3202	3202
准 R <sup>2</sup>	0.576	0.577	0.576	0.627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sup>\*\*\*</sup>、<sup>\*\*</sup>、<sup>\*</sup>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国家和年度固定效应变量。

表 1 的回归结果为本文假设 1 提供了初步支持,但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后还存在其他外交背景,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美国对华遏制等因素,这些政策也可能影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评估的可识别性。为避免这些政策的混杂效应,较为“干净”地识别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纳入新的交叉项变量“一带一路”和美国遏制。其对应回归结果见表 1 模型 2 和模型 3。在表 1 模型 2 中,“一带一路”变量( $BRI^* y2015$ )是“一带一路”国家虚拟变量( $BRI$ )与“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发布后时间虚拟变量( $y2015$ )的乘积。其中,如果一国属于“一带一路”国家,虚拟变量  $BRI$  赋值为 1,否则为 0;时间虚拟变量  $y2015$  在 2015 年以后赋值为 1,其余为 0。纳入“一带一路”变量( $BRI^* y2015$ )可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后对双边外交关系带来的可能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一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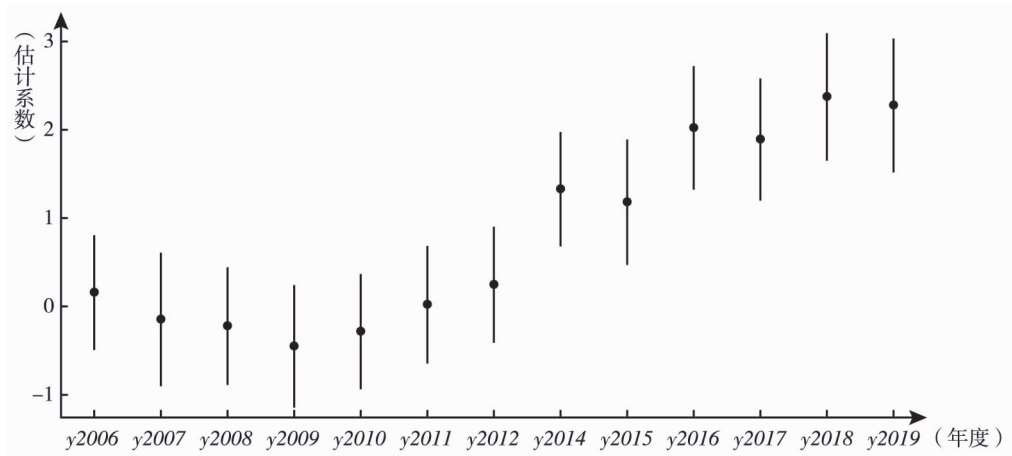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路”交叉项变量  $BRI^* y_{2015}$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也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但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vdummy^* 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带来的影响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这一结果依旧成立。

同样,在表1模型3中,美国遏制变量  $USAall^* y_{2012}$  是美国盟国虚拟变量  $USAall$  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时间节点虚拟变量( $y_{2012}$ )的乘积。其中,如果一国是美国盟国,虚拟变量  $USAall$  赋值为1,否则为0;美国盟国数据来自战争相关项目(Correlates of War)的正式国家联盟数据库( Formal Interstate Alliance Dataset) 4.1版。<sup>①</sup> 时间虚拟变量  $y_{2012}$  在2012年以后赋值为1,其余为0。从回归结果来看,美国遏制交叉项变量( $USAall^* y_{2012}$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美国的一些遏制措施对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没有带来明显影响。此时,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vdummy^* 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了美国的一些遏制措施可能带来的影响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这一结果依旧成立。

最后,为了证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是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sup>①</sup> The Correlates of War, “Formal Alliances (v4.1),”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formal-alliances>, 访问时间: 2021年6月10日。

影响,而非此前其他类似外交政策(如负责任大国等)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基于2002—2012年样本数据进行了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其中随机假设以2008年为新外交理念实施年份,回归结果见模型4。从中可以看出新交叉项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总之,以上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显著影响,即使考虑到其他政策或倡议的影响,该结论依然成立。特别是回归结果中外交访问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而对应交叉项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才有助于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验证了假设1)。

在表1模型1至模型3纳入回归的控制变量中,签发联合公报变量 *comique*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中国与该国在外交活动中是否签发联合公报对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对一国的出口强度变量 *ex2gdp*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中国对一国的出口强度对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没有显著影响;但中国从一国的进口强度变量 *im2gd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一国的出口提供市场有助于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在双边军事联系变量中,中国对一国的武器出口强度变量 *tivc2gdp*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双边军事联系对中国与一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没有显著影响。在国家其他特征变量中,经济规模 *siz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更有可能建立并升级伙伴关系;发展水平变量 *devel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国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有可能建立并升级伙伴关系;经济增长率 *egroth*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国与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国家更有可能建立并升级伙伴关系;国家治理质量 *wgi*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一国的治理质量对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没有显著影响。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双边外交活动测量变量

为了检验双边外交活动强度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表2采用中国外交出访或对中国来访的频次 *dipview<sub>it</sub>* 变量。模型1中,外交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提高双边外交活动强度有助于中国与该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模型2中纳入“一带一路”变量 *BRI\* y2015*、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是外交访问频次变量的滞后1期、2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外交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访问频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ost</i>	0.333 *** ( 5.144)	0.282 *** ( 4.395)	0.362 *** ( 5.867)	0.372 *** ( 5.639)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模型设定		纳入“一带一路”变量	滞后 1 期	滞后 2 期
样本数	3202	3202	3035	2866
准 R <sup>2</sup>	0.569	0.572	0.571	0.578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同表 1) 的回归结果。

## 2. 改变模型回归设定

以上回归中将被解释变量伙伴关系变量作为排序变量, 采用排序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下面将伙伴关系变量作为多值选择变量, 即伙伴关系层级只是不同的方案 (category) 选择, 不再将各伙伴关系层级作为排序数据处理, 因此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对式 1 和式 2 进行估计。回归时将没有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未建交的国家) 作为参照方案 (base-category), 其他伙伴关系层级分类方案可与参照方案进行比较, 针对不同的伙伴关系层级分别得到外交访问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 3 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对伙伴关系影响的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第一部分是外交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交叉项 *dvdummy\* post* 在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四个层级分类中的回归结果。除了在伙伴关系这一层级分类方案中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vdummy\* pos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 在其他三个层级分类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二部分是外交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在四个层级分类中的回归结果, 其回归系数在四个层级分类中均显著为正。

表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多项 logit 回归)

伙伴关系层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伙伴	全面伙伴	战略伙伴	全面战略伙伴
外交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交叉项 <i>dvdummy* post</i>	0.332 ( 1.238)	1.309 *** ( 5.736)	1.360 *** ( 8.575)	2.259 *** ( 14.269)

续表 3

伙伴关系层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伙伴	全面伙伴	战略伙伴	全面战略伙伴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样本数	3202			
准 R <sup>2</sup>	0.224			
外交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ost</i>	0.302 *** ( 3.790)	0.296 *** ( 2.961)	0.330 *** ( 5.230)	0.602 *** ( 10.334)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样本数	3202			
准 R <sup>2</sup>	0.20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 同表 1) 回归结果。

### (三) 异质性检验

在表 4 中, 首先将外交访问区分为出访变量 *dipviewo* 和来访变量 *dipviewi*, 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对应出访和来访虚拟变量以及频次变量的回归结果。出访、来访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o\* post*、*dipviewi\* 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 出访和来访外交活动均有助于中国与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 纳入回归的外交访问变量是正式访问 *offiw* 和一般访问 *genw*, 正式访问和一般访问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offiw\* post*、*genw\* post* 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 但一般访问频次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只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正式访问和一般访问外交活动均有助于中国与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 但一般访问活动对中国与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影响较弱( 验证了假设 2)。

表 4 不同外交访问对伙伴关系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出访变量 <i>dipviewo</i>	-0.066 ( -0.386)	0.098 ( 1.125)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来访变量 <i>dipviewi</i>	0.132 ( 0.823)	0.072 ( 0.805)		
出访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o* post</i>	0.975 *** ( 4.131)	0.312 ** ( 2.565)		
来访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i* post</i>	1.187 *** ( 5.041)	0.354 *** ( 2.895)		
正式访问 <i>offiv</i>			0.012 ( 0.075)	0.074 ( 0.983)
一般访问 <i>genv</i>			0.125 ( 0.693)	0.118 ( 1.397)
正式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offiv* post</i>			1.181 *** ( 5.208)	0.791 *** ( 5.424)
一般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genv* post</i>			1.053 *** ( 4.288)	0.158 * ( 1.645)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样本数	3202	3202	3035	2866
准 R <sup>2</sup>	0.575	0.569	0.576	0.572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了控制变量( 同表 1)。

为更直观地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与外国伙伴关系建立或伙伴关系升级的影响, 下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间为分阶段节点, 对外交访问变量及其分类和不同测量指标进行分阶段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5。模型 1 至模型 3 中, 外交访问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情形。模型 1 中, 外交访问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 模型 2 和模型 3 中, 将外交访问分为出访、来访和正式访问、一般访问, 回归结果也是所有分类, 外交访问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 4 至模型 6 中, 外交访问变量为频次变量的情形, 回归结果

与模型 1 至模型 3 中回归结果类似。该结果再次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才有助于中国与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假设 1)。

表 5 外交访问对伙伴关系的分阶段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外交访问 <i>dipview</i> (2013 年前)	-0.164 (-0.940)			0.086 (1.544)		
外交访问 <i>dipview</i> (2013 年后)	1.652 <sup>***</sup> (8.059)			0.418 <sup>***</sup> (6.687)		
出访 <i>dipviewo</i> (2013 年前)		-0.066 (-0.386)			0.098 (1.125)	
出访 <i>dipviewo</i> (2013 年后)		0.909 <sup>***</sup> (4.538)			0.410 <sup>***</sup> (4.111)	
来访 <i>dipviewi</i> (2013 年前)		0.132 (0.823)			0.072 (0.805)	
来访 <i>dipviewi</i> (2013 年后)		1.319 <sup>***</sup> (6.601)			0.426 <sup>***</sup> (4.301)	
正式访问 <i>offiv</i> (2013 年前)			0.012 (0.075)			0.074 (0.983)
正式访问 <i>offiv</i> (2013 年后)			1.194 <sup>***</sup> (6.011)			0.865 <sup>***</sup> (6.149)
一般访问 <i>genv</i> (2013 年前)			0.125 (0.693)			0.118 (1.397)
一般访问 <i>genv</i> (2013 年后)			1.178 <sup>***</sup> (5.883)			0.276 <sup>***</sup> (4.032)
被解释变量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i>partner</i>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频次变量	频次变量
样本数	3202	3202	3202	3202	3202	3202
准 R <sup>2</sup>	0.576	0.575	0.576	0.569	0.569	0.57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分阶段时间节点。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sup>\*\*\*</sup>、<sup>\*\*</sup>、<sup>\*</sup>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了控制变量(同表 1)。

##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表6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的准确预测率均在80%以上,拟合优度较好。模型1和模型2中访问变量是虚拟变量,外交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模型2中,正式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正式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一般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一般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模型3和模型4中访问变量是频次变量,外交访问频次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正式访问频次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在10%的显著水平上),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包括正式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一般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如果考虑一般外交访问活动的强度,其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本次回归中,还纳入了投赞成票的比例变量  $yshare$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对一项议题投票,如果投赞成票的票数占总投票数的比例提高,则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的相似度。

表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 $dipview$	0.003 (0.160)		-0.011 (-1.594)	
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0.058** (2.422)		0.026*** (4.028)	

续表 6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正式访问 <i>offiv</i>		0.013 (0.745)		0.010 (1.050)
正式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offiv* post</i>		0.075 *** (3.014)		0.028* (1.800)
一般访问 <i>genv</i>		-0.032 (-1.572)		-0.038 *** (-3.624)
一般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genv* post</i>		0.042 (1.584)		0.045 *** (4.582)
投赞成票的比例 <i>yshare</i>	6.766 *** (176.667)	6.767 *** (176.673)	6.766 *** (176.674)	6.767 *** (176.677)
签发联合公报 <i>comique</i>	-0.162 ** (-2.383)	-0.165 ** (-2.415)	-0.144 ** (-2.126)	-0.147 ** (-2.157)
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强度变量 <i>ex2gdp</i>	0.006 *** (5.163)	0.006 *** (5.181)	0.006 *** (5.209)	0.006 *** (5.195)
中国对该国的进口强度变量 <i>im2gdp</i>	-0.004 (-0.164)	-0.004 (-0.158)	-0.007 (-0.264)	-0.005 (-0.202)
中国武器出口强度变量 <i>tivc2gdp</i>	13.702 (0.881)	16.085 (1.032)	13.664 (0.878)	15.080 (0.968)
经济规模 <i>size</i>	-1.642 *** (-19.716)	-1.640 *** (-19.672)	-1.610 *** (-19.319)	-1.620 *** (-19.430)
发展水平 <i>develp</i>	1.588 *** (17.022)	1.594 *** (17.078)	1.564 *** (16.769)	1.578 *** (16.899)
经济增长率 <i>egroth</i>	0.006 *** (4.479)	0.006 *** (4.369)	0.006 *** (4.456)	0.006 *** (4.400)
国家治理质量 <i>wgi</i>	0.064 (1.366)	0.060 (1.264)	0.062 (1.309)	0.059 (1.252)
被解释变量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频次变量
样本数	234089	234089	234089	234089



续表 6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准确预测率(%)	83.642	83.651	83.654	83.652
准 R <sup>2</sup>	0.262	0.262	0.262	0.262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国家和年度固定效应变量。

下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间为分阶段节点, 对外交访问变量进行分阶段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7。表 7 模型 1 和模型 2 中, 外交访问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情形, 模型 1 中, 外交访问虚拟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模型 2 将外交访问分为正式访问和一般访问, 正式访问虚拟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 一般访问虚拟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和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模型 3 和模型 4 中, 外交访问变量为频次变量的情形, 回归结果与模型 1、模型 2 中回归结果基本类似, 只是一般访问频次变量的回归结果有差异。在考虑外交访问活动强度的情形下, 一般访问变量在 2013 年前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但在 2013 年后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该结果再次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 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表 7 外交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分阶段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 <i>dipview</i> (2013 年前)	0.003 (0.160)		-0.011 (-1.594)	
外交访问 <i>dipview</i> (2013 年后)	0.061 *** (3.036)		0.015 *** (2.981)	
正式访问 <i>offw</i> (2013 年前)		0.013 (0.745)		0.010 (1.050)
正式访问 <i>offw</i> (2013 年后)		0.088 *** (4.430)		0.038 *** (2.804)
一般访问 <i>genw</i> (2013 年前)		-0.032 (-1.572)		-0.038 *** (-3.624)

续表 7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一般访问 <i>genw</i> (2013 年后)		0.042 (1.584)		0.045 <sup>***</sup> (4.582)
被解释变量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频次变量
样本数	234089	234089	234089	234089
准确预测率(%)	83.641	83.654	83.652	83.652
准 R <sup>2</sup>	0.262	0.262	0.262	0.26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分阶段时间节点。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sup>\*\*\*</sup>、<sup>\*\*</sup>、<sup>\*</sup>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的控制变量同表 6。

## (二) 异质性检验

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议题涉及不同领域,下面对不同议题领域的投票进行回归检验,表 8 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军事外交及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外交访问变量对中国与他国军事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此时选取的是与核武器及军备等有关的军事外交政策的投票,具体包括:与核武器和核材料有关的投票(*NU*)以及与军备控制和裁军有关的投票(*DI*)。外交访问虚拟变量、频次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促进了中国与他国的军事外交政策相似度。模型 3 和模型 4 是外交访问变量对中国与他国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模型 3 中,外交访问虚拟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模型 4 中,外交访问频次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考虑外交访问活动的强度对中国与他国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表 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与他国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变量 <i>dipview</i>	-0.040 (-1.383)	-0.017 (-1.510)	-0.047 (-0.767)	-0.058 <sup>**</sup> (-2.524)

续表 8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外交访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ost</i>	0.108 *** ( 2.786)	0.040 *** ( 3.903)	0.091 ( 1.230)	0.066 *** ( 3.270)
被解释变量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i>svote2ch</i>
投票议题领域	军事外交	军事外交	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
样本数	71018	71018	30231	30231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准确预测率( %)	73.891	73.942	84.152	84.164
准 R <sup>2</sup>	0.169	0.169	0.241	0.24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的控制变量同表 6。

### (三) 影响机制检验

下面以伙伴关系变量作为外交访问影响外交政策相似度的中介变量并检验其中介效应,表 9 给出了伙伴关系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模型 1 中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该回归系数测量的是外交访问对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的总影响; 模型 2 中纳入了伙伴关系变量,此时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该回归系数测量的是外交访问对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的直接影响; 模型 3 中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且模型 2 中伙伴关系变量 *partner* 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外交访问还可以通过伙伴关系对外交政策互动产生间接影响。此外,模型 1 中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dipview\* post* 回归系数的数值大于模型 2 中相应回归系数的数值,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通过直接效应和以伙伴关系变量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相似度的中介变量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对中国与他国的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表 10 给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和伙伴关系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影响的回归结果,即对式 4 进行回归。其中,模型 1 中外交访问变量是外交虚拟变量,模型 2 中外交访问变量是外交频次变量。本文关注的外交访问变量、伙伴关系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 构建伙伴关系有利于提高外交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表9 伙伴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伙伴关系变量 <i>partner</i>		0.012 <sup>***</sup> ( 2.921)	
访问频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ost</i>	0.064 <sup>***</sup> ( 11.552)	0.063 <sup>***</sup> ( 11.380)	0.088 <sup>***</sup> ( 14.567)
被解释变量	<i>svote2ch</i>	<i>svote2ch</i>	<i>partner</i>
样本数	234089	234089	258108
准确预测率( %)	79.433	79.424	
准 R <sup>2</sup>	0.195	0.195	0.21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sup>\*\*\*</sup>、<sup>\*\*</sup>、<sup>\*</sup>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的控制变量同表 6。

表 10 中国外交访问、伙伴关系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外交访问变量 <i>dipview</i>	0.008 ( 0.500)	-0.016 <sup>***</sup> ( -2.891)
伙伴关系变量 <i>partner</i>	-0.025 ( -1.493)	0.002 ( 0.155)
外交访问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ost</i>	0.005 ( 0.206)	-0.095 <sup>***</sup> ( -14.387)
伙伴关系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partner* post</i>	-0.039 ( -1.947)	-0.112 <sup>***</sup> ( -10.670)
外交访问变量与伙伴关系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artner* post</i>	0.013 ( 0.700)	-0.000 ( -0.003)
外交访问变量、伙伴关系变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虚拟变量交叉项 <i>dipview* partner* post</i>	0.086 <sup>***</sup> ( 3.946)	0.036 <sup>***</sup> ( 9.856)
被解释变量	<i>svote2ch</i>	<i>svote2ch</i>
访问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频次变量
样本数	234089	234089

续表 10

	模型 1	模型 2
准确预测率(%)	79.500	79.632
准 R <sup>2</sup>	0.194	0.188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括号中的数值是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水平。回归时包括的控制变量同表 6。

##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整理 2002—2019 年中国的重要外交活动,统计中国各种外交访问活动的次数,以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对外交伙伴关系和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的影响。其中,外交伙伴关系是从外交部网站所列示的国家中,根据对双边关系的表述中是否带有“伙伴”这一关键词,整理出 84 个伙伴关系国家(截至 2021 年 3 月),将伙伴关系划分为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四个层级,并对这四个层级伙伴关系进行排序赋值。外交政策相似度是利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直接测算中国与他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场的相近程度。

本文采用排序 logit 模型、多项 logit 模型等计量方法回归检验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外交访问活动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升级;在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美国遏制、以前其他类似外交政策(如负责任大国)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伙伴关系变量作为外交访问影响外交政策相似度的中介变量并检验其中介效应,发现构建伙伴关系有利于提高外交访问对中国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中国外交访问除了对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伙伴关系对外交政策相似度产生了积极的间接影响。

对外交访问活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球化和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促进国家间合作行为以及共同追求利益的因素,也为国家如何管理伙伴关系和减少彼此行为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参考。中国伙伴关系外交是建立在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清

醒认识基础上的务实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符合人类所向往的发展目标,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彰显了中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中国和平发展和世界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疫情冲击全球化进程,重塑外交议程,推动外交转型。一些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竞争和压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试图与中国“脱钩”,更给百年未有之变局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当今世界要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以及如何构建的问题,还为探索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体系现代化、使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指导,这更需要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推进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目标是在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中塑造和打压中国快速发展的轨迹,<sup>①</sup>美国联盟体系的存在会阻碍中国扩大伙伴外交的努力,<sup>②</sup>其采取“污名化”策略也会干扰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对中国的伙伴外交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外交伙伴关系将继续朝着更加巩固的方向发展。<sup>③</sup>当前,中国已经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四个周边国家分别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sup>④</sup>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能够有力促进各国从相互竞争、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转向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截稿:2021年8月 编辑:沈 陈)

<sup>①</sup> Hugo Meijer, “Shaping China’s Rise: The Reordering of US Alliances and Defense Partnership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No.2, 2020, pp.166-184.

<sup>②</sup> Deborah Welch Larson, “Can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Role of Moral Leadership,” pp.163-186.

<sup>③</sup> Artyom Lukin, “The Russia-China Entente and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8, No.3, 2021, pp.363-380.

<sup>④</sup> 杜哲元《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3期,第37页。